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刘世强

[内容提要]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 and 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全球治理 战略布局 能力建设 公共产品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7)02-0160-07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7.02.021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决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强烈信号。从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把脉世界经济,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马峰会上共商亚太合作愿景,再到达沃斯论坛上奏响“时代强音”,中国正阔步进入全球治理舞台的前沿,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世界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看,经过持

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推进全球治理的思路和办法。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反过来,参与全球治理对于中国统筹内外大局、应

^{*} 本文系 2015 年度西南财经大学重大基础理论基金项目“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自信研究”(项目编号:JBK151132)的阶段性成果。

对内外挑战也具有战略意义。简言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球治理格局变化、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塑造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必然要求。

第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着眼于克服全球治理失灵,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导致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大量全球问题正在危及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需求上升形成反差的是,治理全球问题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议程。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其继续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均在下降。经过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改革与重建,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但政治极化问题依然严重,社会和种族矛盾持续发酵,在对外行动上逐渐减少干预、全面内顾。欧洲国家近年来危机不断,债务困境、难民涌入和暴恐活动的多重冲击致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明显受挫,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同样力不从心。上述情形造成的结果是,全球治理理念、原则和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规则的供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实际的需求。^① 全球治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失灵和世界秩序的紊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等都是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失败的直接结果。

全球治理失灵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构成了严峻挑战。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大量国家利益踏出国门、走向海外的历史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1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全年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594亿美元,同比增长3.5%。^② 此外,中国在海外还拥有土地、矿山、油田、房产、企业等大量广泛的实体资源。可以说,从国家战略利益到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的海外利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然而,客观而论,中国保护这些

利益的资源手段和能力建设还严重不足,人、财、物在海外遭受损失和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仅2016年一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就处置了超过10万起领事案件。^③ 在此背景下,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紧迫任务。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变化、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抉择。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一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综合实力无可匹敌,战略影响无处不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群体崛起势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推进,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甚至个人的能力都得以放大,传统主权国家的权力遭到分割、侵蚀,进而使得国际权力呈现扁平化的状态。国际权力的转移与扩散导致了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体制绝对垄断的局面出现松动,各国和各行为体纷纷提出反映自身偏好的全球治理方案,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治理的规则之争空前激烈。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发展低谷迈向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基于快速增长的实力地位,中国近年来主动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积极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力地改变着全球治理格局。然而,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后来者,国际话语权不仅难以同西方国家媲美,与自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不相称。“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

^① 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201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③ 《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载于2017年3月9日《人民日报》。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①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从全球治理的被动追随者转变为建设性参与者,通过改革治理体系、搭建治理平台、创新治理机制推进全球治理格局进一步变化,努力将自身意志转化为全球共识,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塑造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必然要求。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也从过去的“崩溃论”、“威胁论”转化为“责任论”,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希望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增加政治和军事透明度,在全球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预防重大疾病蔓延、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议题上贡献力量,为其分担全球霸权成本;发展中国家则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人才培养、投资借贷优惠,帮助它们修建和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并在国际上对抗西方国家的霸道和特权。面对外部世界多样化的责任要求,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清醒和定力,警惕他者别有用心遏制,避免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国际义务;但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期待,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通过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治理,我们可以有效消除外部世界的误解杂音,塑造积极正面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治理领域主动谋划、积极参与,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路径等维度勾勒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布局。目标是奋斗方向,理念是价值引领,议题是关注重点,战略是方式手段,路径是操作路线,五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第一,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旨在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世界进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始终与国内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密切相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两次有关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中都开宗明义地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②这个目标是自近代以来数代中国人的集体诉求,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向。显然,“中国梦”的实现除了依靠中国内部持续的改革创新和民众的不断奋斗之外,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民主平等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如何亚非所言“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为中国利用全球化,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渠道,也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迫于国际压力的被动应对,也不是为了短期利益的权宜之计,而是立足于国家总体战略需求作出的长远安排。

从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通的角度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还涉及根本性的价值命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在其中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在科技进步、财富积累和资源配置上取得了前所未有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正义缺失。全球化的非均衡发展使得国家之间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资源利用、商品消费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不平等还导致了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平等。^④与此同时,国际霸权主义也加剧了全球不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对国际规则的控制汲取外部世界的财富资源,以维持内部超优越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不断挑起国际战争,进一步摧毁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努力。如果仍由这样的不公和冲突持续蔓延,世界将难有和平和安宁。作为世

①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于2015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② 参见刘金源《人民日报新知新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参见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414/c1003-28274338.html。

③ 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④ 参见石斌《秩序转型、国际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追求全球善治方面责无旁贷。这就要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维护自身利益,更需要提倡全球关怀,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推动世界的共同和整体进步。

第二,在治理理念上,中国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先进理念的引领。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①具体到政治实践中,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大力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引领全球治理的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和合主义”和“天下主义”一脉相承,同时也反映了全球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国际现实。从传统来看,不同于西方崇尚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观念,中国文化强调阴阳互补、和谐共生,通过包容变通实现求同存异,通过协商合作化解冲突对立,这对于破解当前世界的治理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现实来看,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双重推动下,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过去那种一家独大、霸道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注定行不通,那种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基础上的逻辑日益不可持续,那种通过以邻为壑政策转嫁风险的做法最终只能损人及己。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弘扬和对国际现实的清醒认识,中国强调全球治理必须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意识的指引下,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理念,即努力推动世界范围的共商、共建、共享。所谓“共商”就是集思广益,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不能搞一言堂,不由一家说了算。“共建”就是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力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共享”就是要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努力实现共赢、多赢,特别是要让全球治理成果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共商、共建和共享是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统链条,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②可以

说,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对旧有全球治理思维的批判超越,又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原则导向和根本遵循。

第三,在关注议题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优先关注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涉及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领域中大量广泛的具体议题。由于实力地位和战略考虑的差异,每个国家对全球治理的优先议题存在不同认知,进而决定了各自的资源投入方向和政策选择空间。在中国看来,全球性挑战之所以层出不穷,一方面在于国家内部治理的失败,主权国家失败所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借助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扩散至世界各地,加剧了全球治理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发展长期不平衡的结果,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霸权机制汲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导致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造就了贫困、饥饿等大量全球性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认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只有实现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失败的社会群体才能摆脱绝望情绪,看到未来希望,从而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

在实践层面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增长领域,面对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国大力提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加快各种双多边的经济合作平台建设,努力推动G20从危机反应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为世界经济摆脱低迷不振、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不遗余力。在发展领域,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为推动全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路基金的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出台,核心就是要提升广大发

①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于2015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②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展中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并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此外,中国在国际多边场合努力推动发展议题的设置。在2015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纲领性文件。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更是将发展问题置于会议日程的核心位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等重要成果。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始终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与共同发展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第四,在治理战略上,中国奉行多边主义,致力于打造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网络。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殖民的方式确立起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依靠军事结盟和分而治之的方式来管理世界事务。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治理世界延续了近代西方列强的传统模式。美国一方面根据自身偏好确立与外部世界的亲疏远近,通过遍及全球的联盟体系维持对世界的控制;另一方面则通过制造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来确保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交织,追求零和博弈、讲求以邻为壑最终将导致损人及己。正是基于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深刻反思,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不追求霸权式主导,而是在充分照顾各方利益关切和舒适度的基础上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进而言之,中国认为世界各国都是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主张通过构建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来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伙伴型治理秩序中,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更加多元,各种国际行为体均能发挥其治理作用,有利于确立更为平等和有代表性的决策机制,形成包容性的普遍规则。”^①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了遍及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推动全球治理作出了中国式的表率与示范。

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思路指引下,中国的全球治理布局得以全面推进。在大国方面,中美之间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海洋环保等全球问题上展

开合作,积极承担两国对人类社会应尽的国际责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成为国际秩序与世界正义的共同维护者;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上进行战略沟通和协调。在周边方面,中国倡导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一起做亚太发展“蛋糕”,共同促进亚太繁荣。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在多边舞台上,中国特别重视金砖国家机制和G20对于完善全球治理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机制化的多边平台凝聚国际共识,确保全球治理的各项方案顺利实施。

第五,在治理路径上,中国以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创新作为基本着力点。目前而言,中国正从两个层面分步骤地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化。

其一,对于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治理体制,中国主张推动改革其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例如,在中国等国家的不竭努力下,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占比从3.996%升到6.394%,正式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俄罗斯、巴西、印度的份额也跻身前十。同IMF类似,世界银行最近一轮改革也将发达国家的一部分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以更好地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此外,中国还主动倡议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填补既有国际金融机制的空白,以此倒逼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建设者,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架构进行适应时代变化的必要改革和有益补充。

其二,对于新兴的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正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立反映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新规则。针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一方面向

^① 陈志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表明其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作出重大贡献。在网络安全领域,中国提出了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五点主张,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①在此基础上,中国正同有关国家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共同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除此之外,在治理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传染疾病、太空、极地等新兴领域,中国都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展现了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三、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前瞻性思考

综合来看,随着国家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步入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心,并逐渐探索出了一幅权利与义务均衡、兼顾自我利益与他者诉求的全球治理蓝图。这一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如何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已成为中国在新时期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第一,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同构性。“在人员、资本、信息、资源等因素快速流动过程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形成了紧密而且频繁的联系,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与国际问题的国内化成为常态。”^②进一步讲,“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愈来愈表现出高度的依存性、渗透性和互动性。在尊重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更需要人们自觉打破两者的界限,从整体性上审视和驾驭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否则现存治理认识的碎片化、区隔化,只能导致治理实践的困境”^③。对于中国而言,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将引导中国政府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审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存在的不足,以巨大的改革压力促进中国的国内治理。^④反过来,只有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持续推动国家内部能力建设,

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好互动,提升社会大众的认同感和满意度,中国才能完善国内治理架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为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多力量。

第二,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如前所述,当前全球治理的症结在于治理全球问题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行动都在显著增加,正在从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供给方。放眼未来,中国需要着力从物质、制度和理念三大层面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物质层面,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通过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进程,同时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成长机会。在制度层面,中国应在原有治理架构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和平渐进手段谋求增量改革,着重解决全球治理机制在公平性、透明度、碎片化等方面的问题,努力增强其公信力与有效性。在理念层面,中国要积极挖掘自身治理经验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之间的共鸣点,提出兼顾中国诉求和世界关怀,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全球治理理念。

第三,强化国际议程设置与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所谓“国际议程设置”是指相关行为体将其关注或重视的议题列入国际/全球议程,获得优先关注的过程。^⑤不同的议程设置决定了国际社会对全球问题解决的优先次序和资源投入。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发起倡议、开展主场外交、搭建国际平台等方式主导全球问题的议程设置,将自身关心的议题转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国际议程的设置权必须获得国际

① 参见《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于2015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杨雪冬、王浩主编《全球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

③ 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④ 参见卢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责任与任务》,载于《前线》2015年第9期。

⑤ 参见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

社会中多数成员的支持或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而言,国际政治的动员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全球治理是涉及不同问题领域、多重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全球治理的难点在于每个行为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偏好,对全球问题紧迫性的认知不一,且存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和资源分担问题。因此,如何在多样化的行为体之间凝聚共识、达成均衡是全球治理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由于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方,大国之间的战略妥协与谅解对推进全球治理尤为重要。当前的中国既是新兴大国的一员,又在某些方面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既与新兴大国一道面临共同的改革发展任务,又与发达国家存在深度的相互依存。这种双重身份的交织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沟通的桥梁。只有牢牢把握“南北对话的中间人”这一政治定位,中国才能协调和整合不同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而增加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动员能力。

第四,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一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仅是其国家总体实力的直接反映,同时也与其学术研究水平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之所以可以长期拥有国际话语霸权,其繁荣发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争鸣功不可没,诸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等,这些理论学说尽管争议不断,但却在无形中巩固强化了美国的国际话

语权力。同样,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成效也取决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学理思考。这就要求学界必须拥有一批具有良好素养和高度自觉的专家学者。他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基础和前沿研究加强对全球治理形势和走向的研判,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内核、研究范式和价值导向上贡献中国智慧、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要能够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深刻变化,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总体原则、优先次序和技术路线图等方面提供理论指导。与此同时,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储备。鉴于全球治理的多领域和复杂性,高校需要打破长期坚持的专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关怀、具备多语言和跨学科背景并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正如习近平在第三十五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的一样:“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①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慈]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于2016年9月29日《人民日报》。